

今天是周末，早餐后我便决定回去看望母亲。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是母亲打来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呀，我想母亲的时候，她也在惦记着我。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离母亲很近，就隔着两条街道。两条街的距离，连接着永恒的亲情，爱是枢纽，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这两条街道来回穿梭。

母亲去年又一次摔伤后，腿脚已经不便出门了。拐杖成了母亲的第二条腿，拄着走路也有些困难，即使是在家里，腿脚还是有些颤抖。我今天回去就是要带她出去剪头发，洗洗头。母亲对于过节日，一直以来都很有讲究，端午节前，母亲一定要将她的头发修一修，她还再三叮嘱家里的大哥、小弟，以及她的孙子、曾孙们，都要去将头发理一理。用母亲的话说，这样过的端午节，才显安康。

回娘家的女人，心情总是无比的愉悦。我撑着阳伞，拎着包包，迈着轻快的脚步，穿过树荫，越过街道，转进小巷，娘家就在眼前了。想想母亲还健在，我还能时常回娘家，有娘家回，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母亲离我很近，但有时因工作上的繁忙与疏忽，我也会好一阵子不去看她，这让母亲很伤心。我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罪感。她子孙满堂，可心里还是经常念叨着我。有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去看望母亲，还是母亲让我过去给她看看。在母亲的眼里，我永远是她长不大的孩子。

母亲知道我要回来，早就坐在家门门口了。看到我，她便拄着拐杖，笑盈盈地站起来迎接我。我牵着母亲的手，扶着她慢慢地走出了家门。母亲几次摔伤后，腰板已经不能挺直了。原本中等身材的她，现在变矮了一截。我牵着母亲的手，感觉好像是在牵着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子。母亲的手有些粗糙，与她十指相扣，能感觉到她的手指有些发硬。暴突的蓝色血管有好几处是灰黑的，那是母亲经常打吊针的缘故。我与母亲慢慢地穿过街道，朝着附近的一家发廊走去。天气炎热，太阳很晒，才走一小会，我与母亲都汗流浹背了。她平时怕冷，怕要感冒，今天穿着短袖，还外加了一件开衩的花衬衣。戴着一顶有边沿的帽子，还戴着一个蓝色的医用口罩。看着母亲“全副武装”的样子，我又心疼，又无奈。母亲走路有些吃力，她脚上穿的紫色布鞋慢慢地挪动着，宛如爬行的蜗牛。口罩捂住了她的鼻子，呼吸很不顺畅。我能聆听到她急促的喘气声。两个人，四条腿，加一根拐杖，就这样并排、艰难地走着。马路上车辆多，人多，熙熙攘攘的，我时不时要提醒母亲看路。从家里到附近的发廊，是一段很近的距离，我跟母亲却觉得很漫长。也许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一路上，遇见熟人跟母亲打招呼，母亲总要停下来与人家聊几句。看到旁边的我，人家总是问道：“是您女儿吗？”母亲总是笑着回答：“是的，是我女儿，她这会儿要带我去剪头发呢。”母亲的话里带着快乐，回响着满满的幸福。我此刻才突然明白，我不知啥时候已经成了母亲的骄傲，成了母亲必不可少的“靠山”。原来，我牵着母亲的手，感到幸福快乐的是母亲，而我，感觉到的却是我应尽的一份责任，一种从未有过的羞愧感，此刻涌上心头。我曾牵着儿子的手，陪他玩耍，陪他长大。儿子是那么快乐，我也曾经感受到初为人母的幸福。儿子结婚后，我当上了奶奶，成了左邻右舍羡慕的对象。当小孙女学会了走路，当我牵着她的手，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我看到了生命的延续，由衷的幸福感也曾经填满我的心田。如今，我牵着母亲的手，我的幸福感在哪呢？

人生本是一场单程的旅行。旅途中，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只是与我们擦肩而过，有的人会牵着我们的手走一程。而有母亲牵着的手，有母亲陪伴的时光，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驿站中，我们是那个要陪着母亲走到终点的旅客。不管她余生的路还有多长，我想我会永远地牵着她的手，陪她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我生于1935年，今年90岁，是名副其实的“90”后。我与《海南日报》的缘分，始于1976年。当年，我被调入琼海县委报道组，与8位同人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主要任务是将琼海各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向《海南日报》及海南电台投稿报道。1982年，县委撤销报道组，只设县委新闻秘书一职，并选定我担任此职，独自挑起全县新闻报道工作的重担。

当上新闻秘书后，我深感担子更重了。当时，我想要组织一支通讯员队伍。这事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领导交代，新闻秘书，负有三大任务：一是个人积极写稿，争取上稿率，全县的重大新闻不能漏报。二是做好通联工作，积极组织通讯员写稿，争取大面积上稿。三是做好协调工作，与《海南日报》及电台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其中，上稿率（个人的，全县的）是关键。这是衡量新闻秘书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上任伊始，为了抓好通讯员队伍的建设，我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扩大通讯员队伍，发布登记通讯员名册，建立起通讯网络；二是同《海南日报》等新闻单位联系，请报社派人来琼海定期举办通讯员学习班，提高通讯员报道水平；三是建立激励机制。规定凡被《海南日报》采用的稿件，凭稿酬单领取同等奖励稿酬。上头条者，还加倍奖励。

新闻报道工作，不能“闭门造车”，要勤动笔，更要勤动腿，我经常骑单车带通讯员下乡采访。突发重大事件，晚上，还要挑灯奋笔写稿，用电话发稿。在本人当新闻秘书的14年中，通讯员队伍由原来的二十余人扩至五六十人。全县在《海南日报》的上稿率，由原来全岛的三四名上升至一二名。我在任新闻头条的前六年，上稿率年年名列全岛第一。其中上一版头条的新闻，百分之九十是本人所写。从1982年至1996年，我度过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14年，我在《海南日报》发表和在海南电台播出的新闻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由于本人在新闻领域的辛勤付出，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被《海南日报》特聘为特约记者，还曾5次获得《海南日报》的好新闻奖。有10年被评为通讯报道一、二等奖。正是由于我在新闻秘书任上的工作成绩，1993年，《琼海时报》创刊，琼海市委任命我兼任市报副总编辑之职，主管报纸一版新闻的组稿、编辑工作。我这可是双肩都挑着重担了。然而，我却有了一种成就感，我感到生命没有虚度并乐此不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担任新闻秘书后的第四年，我的写作道路，发生了质的蜕变——我从记者走进了作家的队伍。这使我的人生事业又登上了另一座高峰。我的写作道路这一质的蜕变，说起来，还是《海南日报》的功劳。1983年下半年，全县通讯员大会召开，当天，在表彰奖励于《海南日报》发稿率高的通讯员后，请《海南日报》记者部主任叶京讲话。叶京在《海南日报》也是写作高手，常来琼海办班培训通讯员，跟通讯员都很熟悉。会上，他表扬了几位上稿量高的通讯员后，突然面向全体通讯员发问：“你们知道琼海有个‘通讯王’吗？”他这突然一问，让众人一时感到愕然，会场处于静默中。此时，叶京用手指向坐在会场前排的王裕超，说：“王裕超在《海南日报》上了不少通讯，可

以称得上琼海的‘通讯王’。大家要向他学习，不但要学会写新闻，还要学会写通讯。”叶京随后讲解了通讯这一新闻体裁的特点。

当时，叶京的讲解，我已听不下去了。因为他把王裕超称为琼海的“通讯王”，这对我产生了好大的刺激。我是琼海的新闻秘书，只会写新闻稿，却不会写通讯，是个不够格的新闻秘书，这是我新闻写作中的短板。当时，我暗下决心，学会写通讯，改变这个短板，决心超过他。

这次通讯员大会后，我找来各种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海南日报》上发表的新闻，进行分析学习。这种集中的学习，好像有了点收获。但实际上，如何提高通讯写作水平，我还找不到关键的路子。直到一个月后，《海南日报》记者曾庆松来琼海，我陪同他乘船到石壁，然后两人骑单车到水口仔苗村，一同在苗村吃住、采访。我一路同他长谈，关于如何提高新闻通讯写作水平的问题，收获极大。当年，曾庆松不仅是一名记者，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他告诉我，除了要学会写通讯，还要学会写散文和报告文学。要从记者走进作家队伍，关键在于提高文字的表现力，要有厚实丰富的文字功底。他说，记者与作家，都在“写”，但属于两种不同的写作范畴。有些人写新闻，成为名记者，但成不了作家。从记者到作家，有一道很高的门槛不好过，那就是过不了语言关，作家要有丰富的语言储备和更强的文字表现力。从记者到作家的路，中国有不少人走过，像中国著名作家穆青，就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穆青写的报告文学《兰考书记焦裕禄》，是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杰作。我知道，曾庆松也是从记者走进作家队伍的。他在采访中把许多有价值的新闻题材，加以文学描写，写成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他的那些散文作品，之前我并不认真拜读，更不探究他如何能写出这样有水平的作品。此次同他到石壁采访，经他一点拨，我有如醍醐灌顶，一时顿悟其中的奥秘。我激动异常，立即订阅了《散文》《散文选刊》《美文》等文学刊物，并找来散文家朱自清、刘白羽、杨朔、徐迟、峻青、穆青、秦牧、贾平凹、余秋雨以及海南作家黄宏地和曾庆松的作品，仔细研读。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品悟其为文之道，吮吸其文章之灵气，撷取其语言之精华。我还按曾庆松的指点，每读一篇经典作品，都要做读书笔记，作品中好的词好的句子好的段落，都要摘记在本子里。他说，这些美文摘记，并非让你在写稿时照抄人家的东西，而是让你经常将其翻阅，让其入眼入脑，久而久之，在无知无觉中，在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日积月累中，便融汇成自己的东西。在自己写稿时，便有那种调词遣字的笔力，厚实自己的文学功底。曾庆松说，这是一种笨办法，但笨得有用。

我采用了这个笨办法。几年下来，便有了好几本《读书笔记》。这个笨办法，终于使我从记者走进了作家队伍。记忆中，我的第一篇散文作品《石榴村漫记》，于1985年发给《海南日报》文艺部的黄宏地。他一字未改发在《海南日报》文艺版“椰风”版上。这篇散文，我以叙述与描写的笔法，把塔洋墨村盛产石榴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这篇散文在《海南日报》副刊“椰风”版发表后，一时在琼海文坛文友中引起轰动。大家都说，王锡钧的文风变了。纷纷打电话祝贺。而我也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从1985年开始，我在给《海南日报》写新闻稿的同时，会攫取一些新闻题材，写成散文并在“椰风”版上发表。由于我的散文创作颇丰，1987年，海南区作家协会吸收我为区作协会员。海南建省后，省作家协会成立，我又登记转为省作家协会会员，后又吸收我为该协会二届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就这样，我从一名记者变成了一位作家，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我从事文学创作更勤奋了。

岁月悠悠，如今，《海南日报》已创刊75周年，而我也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90”后。虽已退休多年，但我从未封笔，我把文学创作当作毕生的追求，既是精神寄托，也是养生之道。遇上好题材，我就写成散文，发给《海南日报》的文艺副刊。《海南日报》文艺副刊已由作家杨道接手编辑。她对我作品的评价，并不因为我年老，而有老化之嫌，相反，她认为我的散文作品，在岁月的陶冶中，依然充满青春的活力。



清代画家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之“饯花会”。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观刈麦》里的两句诗，说的是一年一度的芒种迫在眉睫，而以稼禾为生的农人就得早出晚归，甚至披星戴月，挥镰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也说明芒种时节是农人一年中最忙碌和艰辛的时节，不死都要掉层皮。他们吃不好，睡不好，奔波在田间地头，为的就是一年中到嘴的粮食不能丢，跟老天爷抢时间，跟土地爷要速度。所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

在清代小说家曹雪芹的著作《红楼梦》中，芒种这一天成了贾家大小姐祭饯花神的民俗。该书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里写道：“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颗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

这位浑身才气的曹雪芹，把一年一度的芒种节描绘得如此生动形象，让局外人犹如身临其境，直呼这芒种节富有诗情画意，美得人要晕过去一般。是的，大观园里的那些女孩子，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足生活，见到大观园里的树木茂盛，小草返青，鲜花盛开，莺歌燕舞，彩霞飘飘，怎能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利用芒种节这样别有诗意的日子来祭饯花神，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可是这群富家小姐又哪里知道此时此刻的农人，早已是“夜半呼儿趁晓耕，赢牛无力渐艰行”？她们哪里能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呢？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原来无依无靠，寄人篱下，又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在芒种节这一天，面对花谢花飞花满天，草绿草青青满地的芒种之景，顾影自怜，自怨自艾，不禁涌出一番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慨：“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需用小写意
才能勾画那片绿的辽阔
树叶，挨挨挤挤
流动的翡翠，在光阴里蔓延

所有的凝视，皆有分量
读主干皴裂的年轮
读枝丫举着天空的姿势
读某片叶子蜷起的缺口里
藏匿阳光与虫鸣的私语
读每一寸绿意如何将卑微
站成蓬勃的修辞
从每次的阅读里
我找寻夏天真实的模样

清风徐来
所有的叶片轻轻颤动
像无数只小手，正替夏天
翻晒自己的快乐

小时候，随妈妈下田插秧
光脚丫陷进软泥
不小心一个趔趄
跌进岸边狗尾草的怀抱

放牛途中，采摘那诱人的山莓
我半个身子探入荆丛
四周蓬勃的绿意
漫过我的胸口，藤蔓忙着丈量
我前倾的弧度

夏天，仿佛一位季节的信使
骑着邮车狂奔，与我撞个满怀
交给我一封，春天遗留的信笺

东归喜得夏阴凉，
绿涨云横蝶贮香。
椰影暗沙迎锦浪，
荷塘深巷转红阳。
试挑新米农情好，
还煮咖啡故事长。
毕竟南洋风韵在，
诗图如梦久悠长。

